

独占鳌头的仁德洋行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烟台最大的洋行——英国传教士马茂兰创办的仁德洋行，坐落在大马路上。

新世纪开始，一位英籍老烟台到了现在仍存的基督教教堂（坐落在三马路上），见到了关于马茂兰的石刻，振奋异常。他连续地拍照，因为这里是马茂兰经营花边的发祥地。

关于马茂兰的发迹史，已

故“史痴”赵树棠先生查阅了很多解放前的资料，澄清了若干似是而非的说法。比方，他看准了胶东妇女心灵手巧才下了经营花边的决心。事尚未做，焉知手巧？事实上，马茂兰在花边上并未原创，他是得到了顺泰洋行华人老板梁浩池的赞助，才盘下要返国同胞的经济实体，他的捷足先登，借助于官商勾结，借助于英国教会，借助于教育产业化。他在南山路办相当规模的花边学校，招收云集烟台的“农民工”子弟，尤其是饮食无着的女孩子，半天学习《圣经》，借以识字，半天学习花边制作。这种在英国有着广大市场需求的产品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，所以，这些女学生很快就

成为没有薪酬的廉价劳动力。马茂兰长袖善舞，他的办学打着“慈善义举”的旗号，还有着布道传教的外衣，英国政府在税收上给予了极大的优惠。这令他在竞争中处于特殊的优势，很快成为山东外贸之首。

马茂兰绝不仅仅经营花边，他首先是个传教士，因为在三马路上盖了个很像样子的教堂，而且建立了出版机构，印行《圣经》等教材。他那女子花边学堂也不断地扩大规模，1896年（清光绪二十二年）在三马路建起了甚为壮观的二层楼，招收学生达千人之多。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“南山路小学”，是烟台颇有名气的优质小学。

马茂兰获利甚丰，这当然是十万花边女工的血汗结晶，但是却不能用一个“剥削”概括之。仁德洋行把花边技术从英国引进到烟台，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技师，还从烟台推广到周边各县，包括栖霞、牟平等山区，成为烟台广大农村支柱性的副业。不仅增加了家庭收入，而且改变了妇女的地位，为妇女的解放奠定了经济支撑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，往昔由于没有独立收入，完全依附于他人，现在由于花边，可以获取不菲的货币，也就有了某种发言权。

1928年，仁德洋行在大马路修建了拥有两层豪华楼房，两栋平房，建筑面积过万平方米的新址，成为当时的洋行之冠。

家有水缸 着火不慌

吕富苓

黄县地儿过去都是打井水吃，家中放有大水缸。清晨，你就会听到嘎嘎的轱辘响，勤劳的人们首先要挑满水缸里的水，再去打扫庭院，干别的活。

水缸是家家必备之物。稍富裕的人家，吃水的缸是金刚钻缸，即外表油光锃亮的上着一层釉，有凸凹花纹的，像九龙戏水的，叫“龙缸”；不富裕的，就用水瓮，瓮是泥烧的土陶器。缸不太渗水，瓮能渗水。农家一看见水缸穿水裙了，就说天要下雨了，因为空气的湿度变大了。

儿子说媳妇，女方常以某种方式了解男方的家境，会说：“看来过得不错，用的是大水缸。”儿子结婚后要成家，父母首先要给准备水缸和碗筷。有的人家儿子成家，会为争个水缸闹红了脸。

其实家里备几口盛水的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，就是防火。黄县地儿的四合院，北屋多是三间半，中间的叫正间，房门南有两个锅台，房门北就放水缸了。不上冻的天，院子里也放水缸。有个烧火不小心，灶前的柴火着火了，从水缸里舀两瓢水泼上，火就熄灭了。曾经有一户人家，夏天在蚊帐里点灯抓蚊子，不小心，蚊帐着火了，水缸里又没有水，结果烧死了两口，衣物更不用说。讲究的人家，是很注意家中备水的。

我们参观北京故宫和曲阜孔府宫殿，殿前有两口水缸，有说是盛油的，好点灯；有说是盛水的，好防火。主要是盛水，防火。

1999年，我搬进了现代化的楼房，冬天集体供暖。已百岁的母亲坚决要求我在家里备水缸，以防万一。我觉得也有道理，就买了两个红色的塑料桶放在卫生间，保持满满的水。虽然十多年了未有火灾，但不供水时却帮了大忙。再者供暖时家里太干燥，有水蒸发也能调节些。

请您也在家中备几桶水吧，防患于未然。

我儿时的童谣

于新武

过去，胶东地区流行着很多歌谣。这些歌谣大多是老人哄孩子时唱的。有些已经失传了，有些也正在慢慢消失。通过走访老人，我挖掘整理了几则我儿时的童谣，摘录如下：

大国女，上枣树（当地读xu音），抬头看见她女婿。你来吧，俺不去；等着滴滴答答俺再去。（滴滴答答，意思是结婚迎亲时吹喇叭）

吡锯——割（当地读ga音）锯，割倒姥姥大槐树；姥姥不给饭吃，抓个鸭子掐个蛋吃。煮也煮不烂，急得小妞啃锅沿。

小老鼠，上灯台。偷油哈（喝的意思），下不来。叽叽哇哇叫奶奶。

背背——哎哎，上街——要耍。一拾拾了个破棉袄：丢了把——可惜啦，穿着吧——虱子咬，拿回家去抓抓吧（这里是指抓虱子）。

小板凳，磕（当地读ka音）歪歪，爷爷娶个后奶奶；又擦胭脂又抹粉，喜得爷爷吧嗒嘴。

故乡里消失的声音

张功基

回到故乡，漫步在大街小巷和村口路边，看到的只是一些熟悉而亲切的景物，耳边却再也闻不到鸡猪牛马驴骡的叫声——这些当年故乡嘈杂声音中的主要音符，如今早已湮没在过往的岁月河流里，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故乡家家养鸡，户户养猪，队队养牛马驴骡，这是那时故乡的一道耀眼风景。而这些家禽家畜从早到晚的各种叫声，也构成了那时故乡最具生活情韵的声音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那时农家孩子最早认识的就是这些家禽家畜的模样，最早熟悉的也莫过于这些家禽家畜嘴里发出来的声响，特别是每个农家孩子勤劳持家的意识，更在割草剥菜侍弄这些家禽家畜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。

家家养鸡，多是散养。每家一只公鸡领着一群母鸡，优哉游哉，或觅食于街头巷口，或嬉戏于院落墙角，遇上狗惊猫扰，鸡们便咯咯乱叫，有的飞上草

垛，有的蹿上墙头——这种声音无论春夏秋冬，总是此起彼伏，从不间断，给枯燥的故乡日子增添了些许生动。傍晚时分，鸡们大都会按时回到各自的笼舍，碰到不肯老老实实归巢的鸡，主人免不了追打呵斥，那些鸡自然也就扑棱着翅膀大呼小叫，这成了村里每天暮霭缭绕时的街头闹剧。在农家老少的耳朵里，公鸡的喔喔报晓声，嘹亮而自豪；母鸡的咯咯下蛋声，快乐而骄傲。但夜里遭到黄鼠狼偷袭时，不管公鸡还是母鸡，发出的叫声同样惊惧而凄厉，连沉睡的村子也霎时变得惶恐不安起来……

户户养猪，全是圈养，而且猪圈都在院子里，这是故乡民居建筑的典型特征，即正房的西窗外与西厢房之间建有猪圈。在整个生产队期间，养猪是农家劳作之余的一项家庭副业，有了攒粪和卖猪这两项收入，拮据的日子才多了一份宽裕。那时候，每家猪圈一年四季都是闲不着的，农家卖了肥猪很快就得去集市上买小猪，只要圈里有了猪，一家人心里才

踏实。但踏实归踏实，烦人的猪叫声却不能充耳不闻。猪是不安分的角色，除了睡觉，它饿了的时候，不是长一声短一声地叽叽歪歪，就是两条前腿搭在圈墙上尖叫不止，即使不饥不饿嘴里也要哼哼唧唧，因此猪的叫声就成了农家院子里最自然不过的声音，这种声音朝朝暮暮陪伴着农家的每一个日子，父老乡亲便有了为之向往的一点儿期冀和盼头。

队队养牛马驴骡，是在生产队的饲养场里。那时候没有农业机械，春种秋收哪一样农活也离不开牛马驴骡，这些牲口就是不会说话的“社员”，它们起早贪黑地劳作，默默地替农家分担着劳累和忧愁。田野里、道路上、树荫下、街道旁，到处可见它们的身影，四下可闻它们的叫声。整日回荡在乡野间的驴嘶马鸣、牛哞骡叫，和农人的鞭子声、吆喝声交织在一起，汇聚成了那个艰辛岁月里声情并茂的故乡绝唱。当然，牛马驴骡的叫声并不会充盈着快乐，农人们含辛茹苦忙活一天，回到家里还有“老婆孩子热炕



头”，而牲口们劳累一天，得到的抚慰不过是一点儿草料而已，惟有雪花飘舞的冬日，听着它们在槽头安逸的咀嚼声和高高低低的响鼻声，才使人觉得它们终于有了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故乡一带的农家不再养鸡、养猪了，牛马驴骡也逐渐被农业机械所替代，喧闹的乡村一下子变得清静了许多，但清静的时间久了，反倒让人怀念起那些曾经不绝于耳的家禽家畜的声音来，而且每每怀念时，总有一丝惆怅的况味淡淡地飘上心头。

朝阳街上卖泥印

毛贤君

读书写作之余，我喜欢徜徉在老街旧宅。如果说大海是烟台街的父亲，那么饱经沧桑，风雨剥蚀的老街旧宅就是烟台街的母亲。月光下，漫步老城区，回忆往昔的生活，如品美酒，如饮浓茶，每每兴趣盎然，乐此不疲。

逛老街我最愿逛朝阳街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七八岁时，我住在朝阳街一个大杂院里。那么大杂院里孩子多，孩子们的游戏也多，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卖泥印。每当农历端午节前后，正值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的季节，烟台的大街小巷来了拐着篓子，挑着担子来卖杏子的农民，这是孩子们欢乐的节日。向父母央求半天，要几百元钱（旧人民币，相当于现在几分钱），买斤杏子，杏子吃了，杏核（烟台土话叫杏固）就成了孩子们手中的货币。杏固砸碎了杏仁能吃，还可做药材，药房收购。

哪个孩子手中的杏固多，就算有能耐，用如今时髦的话说就是“大款”，别的孩子就羡慕的要命。家境富裕的毕竟是少数，和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是吴国相，我们俩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，大人们都称我们是庙里的哼哈二将——一对。我们俩也非常羡慕有的小伙伴手中的

杏固多，伸手向父母要钱去买杏子吧，穷人的孩子早岁也知世事艰，于是只好卖印泥去赚杏固了。

磕（烟台土话音ka）泥印就和母亲们碾面鱼、莲子这些美食一样，只不过做面食的模具室木头的，做泥印的模具室陶器（烟台土话叫泥磕）。先把黄泥和水调好，往泥磕里一按，把多余的泥刮掉，把泥磕扣过来，再把泥磕里的泥块倒在翻过来的木制洗衣板上，晾干后，一个泥印就出来了。

泥印上蟹子、虾、鱼、石榴、葡萄图形无不栩栩如生，活龙活现。可孩子们最喜欢三国、水浒、西游上那些人物肖像泥印，如关羽、张飞、武松、鲁智深、猪八戒、孙悟空无不形神兼备，惟妙惟肖。这些泥磕以圆形居多，直径约有五六厘米。那时的人哪有收藏眼光，这些泥磕如果保留到现在就弥足珍贵，价格不菲，可为研究民俗的专家提供珍贵的资料。哦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哟，在这么小的泥磕上怎样刻出花、鸟、虫、鱼、人物，至今想来，不由为他们精湛的技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放暑假时，我们就用洗衣板端着泥印，在大成胡同、广东街的大杂院里，串来串去，高喊：卖泥（烟台土话音mi）印来！卖泥印来！小伙伴们就用杏固来



买我们的泥印，渐渐的，我和吴国相俩衣服口袋里的杏固越来越多。

别看吴国相属羊，比我小一岁，肚子里很有道道，用如今时髦的话说是很有经济头脑。他找来墨汁、红钢笔水、水彩画颜料把泥印一染，嘿，产品低档变高档，这下引来孩子们的交口称赞，爱不释手。可是泥印的价格翻了一番，小伙伴们想买舍不得杏固，不买又经不住诱惑，只好到处去找杏固。我和吴国相俩也不时在小伙伴们面前，故意拍拍衣服口袋里装的满满的杏固，眼馋人家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们也俨然挺胸凸肚成了

大款了。30年后，我和吴国相又都在烟台制革厂工作，不过他从外单位调来任厂长，我在烧锅炉，那时我们都年近四十岁。这也许是在上苍在冥冥之中的安排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！

2008年秋，吴国相心脏病突发，不幸病逝，我十分伤心难过。那时他不到65周岁，还没捞着享受乘公交车半票的待遇就英年早逝，不由人扼腕叹息。如果如今他还健在，我俩凑在一起聊天，回顾童年时代的趣事，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。哎，吴国相你怎么走得那么早呢？人生没有如果，只能感叹，人世不如意事常八九……